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与近代化

许　檀

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自宋代起步，于明中叶崛起，到清代中叶已跃居全国先进之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经商人口急剧增加，商品意识深入人心，这些都预示着三角洲有可能充当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①那么，鸦片战争给三角洲带来怎样的影响？三角洲如何应付新的历史性的挑战？近代以来三角洲商品经济与近代工业的发展轨迹和特点如何？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的社会动荡与商品经济的调整

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特别是明中叶以降，随着珠江三角洲开发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与三角洲商品经济的相互联系日趋紧密，乾隆22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的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口，更赋予广州以特殊优越地位，使之在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

广州独口通商的地位，无疑对促进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到清代中叶，三角洲的蔗糖、水果、蚕丝、陶瓷、铁器等产品都已形成专业化生产区。不过，粤海关进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还是转口贸易，其中最大宗的出口商品茶叶、生丝及丝织品约占出口总值的60—80%（见表一）。茶，主要是福建的黑茶、安徽的绿茶；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因此，三角洲人口中从事商业、航运业以及服务于商品流通者为数众多，据时人的粗略估计，三角洲主要县份中大约有30%左右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②如果这一估计大体不错的话，那么清代中叶三角洲五百余万人口中至少有百万以上是藉贸易以为生计的。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个通商口岸，其后又陆续增开汉口、九江、天津等口，茶、丝等大宗商品转而由更为经济合理的流通路线输出了。上海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等原因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外贸进出口的最主要港口。自五十年代起上海的生丝出口量就超过广州。茶叶，五十年代安徽、浙江、福建的茶叶已改由上海、福州出口，只有两湖、江西的茶叶仍取道广州；六十年代汉口开埠后，两湖、江西的茶叶也就近由汉口输出，广州出口的茶叶就只有本地所产了。贸易腹地的缩小使广州港的贸易额迅速下降，1844年广州港外贸进出口总值为3340万美元，1848年降至1510万美元，1855年下跌到仅只650万美元。③

广州港贸易地位的下降使大批直接或间接为其外贸服务的行业陷入停顿或衰落，一大批从事外贸的行商、散商、通事等纷纷转向上海、天津等新开口岸，成为外国资本的买办。如上海洋行买办即"半皆粤人为之"。④而数以万计、十万计的挑夫、舵工、水手、商伙等"藉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⑤则沦为生计无着的流移人口。四十至五十年代广东天地会起义，红巾起义相继发生，从者"十万之众"，正是以这些人为骨干的。如1854年东莞石龙镇的起义，三

水、佛山的起义，参加者多为"皮、鞋、油、糖、棉花各行店工人"，以及江河、沿海船户、水上居民等等。起义领袖陈金缸、陈开等本人即是箍桶工匠。⑥

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变动及社会动荡，还导致这一时期大量移民奔赴海外谋求生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移民高潮即是社会动荡的产物，也是社会动荡的一个表现形式。其时，正值澳洲、北美的淘金时代，需要劳动力甚多，故三角洲移民大量涌赴彼地。据不完全统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降的二、三十年中广东沿海移民赴澳洲谋生的人数约在8—10万人左右。如维多利亚州1854年只有华人2341人，1858年猛增至42000余人；新威尔士州1854年只有华人1800人，五年后即增至12000余人。新威尔士州及悉尼的移民主要是中山、东莞、高要、增城县人；维多利亚和墨尔本则以四邑人为多，其次是南海、顺德、番禺等县去的华人。⑦美国西部的加州是三角洲移民的又一主要地点，据说当时由中国赴美的移民"一年达十万之多"，三角洲则以中山、台山、开平等县赴美移民较多。⑧

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贸易衰退和社会动荡，面对新的形势和市场需求，三角洲商品经济开始了自身的调整。

首先是蚕桑生产的扩大。三角洲的蚕桑业在鸦片战争前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清代中叶，以九江、龙山、龙江等乡为中心，一个"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的专业化生产基地已经形成。⑨咸、同年间，欧洲产丝国因蚕瘟引起生产不足，加之太平天国革命导致江浙蚕丝出口受阻，国际市场对粤丝的需求日益增加。丝价的上涨，促使珠江三角洲再次出现"废稻树桑"的高潮。六十年代后期，广州的生丝出口渐恢复增长的势头，1868年广州生丝出口达585万元，较上年增长26%。⑩五、六十年代之交，广州的生丝输出仅占全国输出总额的8%；到同治九、十年分（1870、1871），已占全国输出总额的四分之一，并仍保持增长趋势。⑪1872年，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商务报告指出："粤丝出口的增长是很显著的，并且已达到几年没有预期到的数量和重要地位。……（粤丝售价的提高）大大地刺激了这一贸易，向来种稻的大片土地现已经或正在辟为桑林，因此每年的出口都可望增加。"⑫

茶叶，广州的茶叶输出，1870年为最低，仅六万余担。其后的十年间稍有复苏。此时，外省茶叶已不经广州出口。因此，出口的增长也就意味着本地植茶及制茶业的发展。同治年间，番禺的蓼涌、南村、市头等地已种植茶树，清远的笔架山等地茶叶年产达六、七十万斤，新会的绿护屏以西数十顷山地也已栽种了茶树。⑬制茶工艺方面，"粤茶以培制方法素极审慎，至是渐享盛名，售价亦视上述各埠（指上海、汉口、福州等）为高。"⑭1872年广州输出的茶叶价值为5558万元，⑮甚至超过四、五十年代广州进出口贸易总值。

鸦片战争后，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向扩大本地区产品的输出为主的方向转变。不过，茶叶生产由于没有质的飞跃，到八十年代末终因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失败；而蚕丝生产则由于机器的引进得到蓬勃的发展，从而使三角洲商品经济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跃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机器缫丝业的迅速发展及以蚕丝业为中心的贸工农体系的形成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缩短了中国到欧洲的航程，世界市场对粤丝的需求日益扩大。形势对三角洲蚕丝生产十分有利，同时，也面临一个新的危机。当时，进口中国生丝的英法丝业界已对中国生丝的质量提出严重警告，要求改进缫制和包装质量。⑯在

南洋经商二十年之久的南海华侨陈启源在国外看到法国人所设丝厂，"机器制丝，产品精良"，为振兴家乡的蚕桑业，于 1873 年回到家乡南海简村，创办继昌隆丝厂，将先进的机器缫丝工艺引进中国。机器缫丝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生丝质量远胜于手工产品，既满足了外商对质量的要求，价格还较土丝高出 1/3，销路大畅。

继昌隆丝厂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所创办的近代工业，也是三角洲商品生产近代化的起点。珠江三角洲原本就是蚕丝业中心之一，有充足的蚕茧供应，又有手工缫丝技术的基础，创办一个机器丝厂投资不大，而获利颇丰。因此，机器缫丝业一经出现，发展极为迅速。到八十年代初，南海、顺德一带已有机器丝厂十余家，八十年代中后期发展到五、六十家。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又增至百余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蚕丝业的鼎盛时期，三角洲共有丝厂二百余家，其中顺德一县即有一百数十家，南海县也有三、四十家。⑱

厂丝（机制丝）迅速取代土丝成为出口商品的主体。1883 年厂丝出口始见于海关统计，仅为 1254 担，占当年生丝出口总量 9556 担的 13%。仅仅三、五年之后，厂丝出口即超过土丝（即手工丝）。进入 1890 年代，厂丝出口已超过万担，继而又突破两万、三万大关，在生丝出口中，土丝所占比重已不足 10%了。⑲民国年间，三角洲的生丝出口每年约在三——五万担，在广州外贸出口总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国年间生丝出口情况详见表二。

表中可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角洲的生丝出口每年约在四——万担，价值四、五千万海关两，约占广州外贸出口总值的 50—60%。这还只是生丝的价值，如果将水结及丝织品的出口一并计入，其出口值将更高，可占到出口总值的 70—80%左右。⑳生丝已成为广州外贸出口的当家产品，以出口为目的的缫丝工业及其收入实际上成为三角洲乃至广东全省经济命脉之所在。

机器缫丝业带动了三角洲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首先，机器缫丝业对原料需求的不断增长，使三角洲在光绪年间又一次掀起大规模的"废稻树桑"高潮。除原有的蚕桑区种值面积更加扩大外，三水、新会、东莞等原无蚕桑业的地区也得到发展。㉑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珠江三角洲的蚕桑区已扩大到顺德、南海、香山、新会、三水、番禺、鹤山、东莞等十余县，桑田面积达万顷上下，从事蚕桑业的人口达二百余万，每年蚕茧产量三、四十万担，价值六千余万元。㉒蚕桑业已成为三角洲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柱。尤其是作为蚕丝业中心的顺德，桑田面积已达耕地面积的 50%（鱼塘占 40%，稻田仅占 10%左右），蚕业人口占全县人口的 80%上下，蚕茧产量占整个三角洲总产量的 50%以上。㉓稻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使三角洲本已存在的粮食短缺愈益严重，洋米的输入大幅度增长。二十年代的十年间，广州平均每年输入洋米 900 万担上下（此外，土米输入年约百万担），主要来自安南、暹罗、印度、缅甸等地。㉔洋米的输入除供广州城市居民消费外，主要是满足三角洲蚕丝区的粮食供给，特别是作为蚕丝业中心的顺德、南海。顺德县"全邑产米不足半月之用"，南海县的粮食产量也仅够四、五个月之需，"余则仰给洋米"。顺德县的米价甚至每担比广州市还要贵 1—2 元，其余瓜、菜、薯、芋，日用食品，除塘鱼外皆仰给外来，价格亦比省城广州高出 1/10 左右。㉕近代工业的发展使三角洲的蚕桑业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不仅仅是量的扩大，而且是质的飞越。输入洋米（以解决口粮）——→种桑养蚕售茧——→机器缫丝（提高了附加值）——→出口生丝，商品生产的近代化和通过世界市场的循环，不仅较好地解决了三角洲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这一循环过程创造了增值效益，带动了整个三角洲经济的运转，使蚕丝区的农村经济充满活力，农民生活也较

之其他地区富裕的多。

蚕丝业的发展对三角洲的商业、金融业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蚕丝业鼎盛时期，顺德成为全省最大的丝、茧市场，集中于此的丝行、茧栈占全省的80%以上。蚕茧贸易尤以顺德的桂洲、容奇为最，该埠茧市专设有轮船往返于沿江各乡，购运蚕茧到市，再转售于丝厂所设的茧栈。各丝厂设在容、桂两处的茧栈即有百间之多。南海的九江、平洲，香山的小榄、以及鹤山、东莞等县的茧市，也多将所收蚕茧运至容、桂，转售于茧栈。各丝厂购买原料、支付工人工资，各茧市的资金周转，多需靠银业贷款。故每届蚕茧、蚕丝上市，由广州运往顺德的现银平均每日多达30万元，全县每月有上千万元的现款流动。丝业的季节变动、盛衰变动都直接左右着广东金融业的畅旺与否。顺德人所开银号占广州银号总数的50%以上，资本额更超过50%，故有顺德人“执广州银业界牛耳”之谓。㉖甚至“广州和本省其他各城镇生意大都依靠顺德丝业在金融上的支持”，㉗并且有不少丝商、银业商已直接投资缫丝工业了。㉘

以蚕丝业为中心的国际循环对于三角洲的外贸平衡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近代的进出口贸易，从整体上看是输出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输入工业制品。即输出低值产品，输入高值产品。这一特点正是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的反映。不过，如果进一步具体分析三角洲蚕丝区的进出口贸易则略有不同：它是以输入洋米，输出生丝构成一个循环过程的。生丝的输出无疑是帝国主义原料掠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三角洲输入的是低值产品，输出的是高值产品（相对而言），通过进出口贸易创造了增值效益。这正是三角洲蚕丝经济高于其他地区的成功之处，也是广州一埠能够在全国对外贸易总体入超的情况下，长期保持出超㉙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整体不利的大环境下，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和时机，首先使局部利益得到改善，这是后进国家或地区发展道路上应极力注意的问题，也是他们有可能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关键所在。在这一点上，近代珠江三角洲的蚕丝经济无疑是有其成功之处的。

这样，以机器缫丝业的发展为中心，三角洲的农业、商业、外贸、金融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以顺德、南海为中心，以出口为导向的贸—工—农经济体系已大体形成。蚕丝业的出口收入每年达五、六千万海关两之巨，成为三角洲经济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项是侨汇收入，详后）。

三 其他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上海、天津等新开口岸，洋务派创办的企业也多集中在长江流域和华北。珠江三角洲地区，除十九世纪40—60年代英、美等国投资的船舶修造业，以及光绪年间清政府投资的军工企业外，近代工业的发展主要是民族工业。

较上述机器缫丝业的兴起稍后，大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三角洲陆续兴起了一批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据不完全统计，1895—1913年三角洲新建机器、船舶修造厂10余家，水电厂4家，机器磨粉业6家，建筑材料砖瓦、水泥、玻璃等厂4家，火柴厂5家，卷烟厂2家，印刷、造纸等厂3家，缫丝厂50余家，织染厂5家，机器织布厂10余家。㉚二十世纪初的《广东商务调查》中称，广州之制造厂“凡用外国机器制造者曰袜，曰丝辫线、曰胶灰、曰玻璃，其出货俱称大宗；此外用机器制成之货尚络绎不绝。”㉛两广总督谭钟麟也说，广东“工商两项较他省为盛，近年风气大开，有以机器仿制洋货者，有制土货专

销外洋者、造作日精、行销日广。”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机器制造业已拥有一定的能力、能够制造缫丝厂、碾米厂所需的机器、锅炉等等、不仅能够仿造外国机器，有些还能有所改进，其价格则比进口洋货便宜的多。㉝船舶制造方面，华资船厂也已能制造轮船。据1900年的海关报告称、广州河南“现有几处船厂系华人开设，甚为兴旺。其小轮船大半皆由彼处造成、并配机器。”这些工厂已能制造“各种大小、各种样式的轮船，包括双螺轮机船、外轮轮船等，这些船都造得很成功。”㉞机器修造业的这一基础、对于三角洲近代工业和近代航运业的进一步发展应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二十世纪以降、三角洲缫丝厂的机器多由当地机器厂、店制造、这对降低丝厂开设成本，促进缫丝业的蓬勃发展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因素。

近代交通业的发展，三角洲也走在全国的前列。1905年爱国华侨陈宜禧集资修筑新宁铁路、历时14年，建成车站46个，大小桥梁215座，涵洞236个。以台山县城为中心，北抵江门、南至斗山，西抵白沙，通车里程150公里。同时还为台山带起了新宁机器厂、新宁印刷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和一支新的产业大军。(陈宜禧曾设想把新宁铁路往北延伸至佛山，与广三、广九铁路相接，这样，即可形成一个覆盖整个三角洲的铁路网、可异未能实现)。航运业，如光绪15年创办的民营平安轮船公司、经营内河航运；1902年由美国、加拿大华侨创办的江门四邑轮船公司，并设了由江门——香港的客、货定期航班；再如广州侨轮公司、侨办新南海轮船业等等。㉟三角洲地区的水运在清代中叶已十分发达了、这些航线在近代仍然保留下来。所不同的，一是各主要码头都增加了至香港的航线、二是火轮船已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木船。1911年在广州登记的内河小轮船共310艘、其中“华船”300艘、而“洋船”仅只10艘。㊱这些“华船”，多是由三角洲的华资船厂制造的。

三角洲的公路建设稍晚于铁路和航运业，进入二十年代才有较大的发展。公路的修筑主要集中在三角洲西部的丘陵区。如，台山县自1923年开始修筑、到抗战前共完成公路36条、其中干线13条、支线23条。又如，新会县共修建公路12条、开平县亦修建10余条。总计20——30年代，三角洲至少修建公路六、七十条、组建汽车公司数十家。㊲近代交通业的发展使三角洲形成一个铁路、公路、航运相互交织、四通八达、网点密布的水陆交通网、并且一直延伸至三角洲的绝大部分乡镇。铁路、公路的相继开通，轮船的使用、使处于河网地带、原来水运较为方便的广州和南海、顺德等县更加如虎添翼；而台山、开平等原来交通不便、“运载则用手车、旅行则用肩舆”之地，也一改往昔的闭塞之貌、货畅其流、行旅称便、大大促进了四邑侨乡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一些新的行业、如保险业、新式银行、百货公司等陆续兴起、而三角洲地区原较发达的商业、金融业也注入了一些新的气息、开始向近代企业转化。

四　华侨在三角洲近代化发展中的重大贡献㊳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特点和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外贸港口、三角洲人口中从事海外贸易者甚多、他们中的一部分长期侨居异国、子孙繁衍、成为华侨的先辈。再加上近代以来的移民高潮，故三角洲华侨人数众多，成为全国最主要的侨乡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珠江三角洲几个主要县分华侨人数至少有一百数十万以上、侨汇每年在数千万元以上、侨汇收入是三角洲经济的两大支柱之一。其中一部分用于侨眷的消费，另一部分则成为三角洲的建设投资。不过、华侨对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还远不只此。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最早接触现代文明、接受

新思想新事物，开阔了眼界，并且把现代文明之果带回家乡，使之生根、开花。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首，他们是中国农村近代化的先行者和倡导者。

（一） 华侨是三角洲乃至中国民族工业的创始者。1873 年南洋侨商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丝厂，不仅是三角洲近代工业的起点，也是全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其后，三角洲缫丝工业迅速发展（其中华侨直接投资者有 20 余家），成为三角洲地区的支柱产业。继昌隆丝厂的创办，对缫丝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三角洲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1879 年肇庆旅日华侨卫省轩在佛山创办的巧明火柴厂，则是我国民族火柴工业的开端。不久，三角洲陆续兴办火柴厂七家，产品均以“午龙”为商标，开始与日货相抗衡。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仅广州即有火柴厂 20 余家，平均月产量 15600 箱，除供应本省及西南地区外，有 30%的产品销往国外，主要是南洋群岛、安南、檀香山等地。1910 年台山华侨余觉之、余乾甫等集资 12 万元创建的江门造纸厂（股东多为台山旅美、旅加华侨）是中国最早的三家纸厂之一，1913 年又增资改建，转产新闻用纸等，产品除供广东、云贵一带外，还销往南洋。1917 年，马来亚华侨陈玉坡、张志瑞、卢凤池等在广州创办的“广东兄弟胶厂”则是中国橡胶工业之始。1919 年正式投产，到 1932 年已发展到 30 余家，产品畅销全国，年产值不下 400 万元。

华侨在三角洲近代工业方面的开创之功，不仅使三角洲经济发展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而且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业。

（二） 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科学技术和人材的引进、传播过程。华侨创办的近代企业，与机器的引进的同时也都聘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负责生产管理。这些技术人员有的是本乡子弟留学国外，学成回国创办企业，如东山火柴厂的正、副经理和技师都曾留学英、美，专攻火柴制造，回国后集资创办该厂。江门造纸的创办人和工程师也都曾留学日本，学习化学工业。亦有靠在国外多年工作中积累经验，掌握技术，回国图谋家乡发展的，如创办新宁铁路的陈宜禧，在美 40 年，曾参加美国西部太平洋铁路的修筑，从筑路工升至管工，直到工程师的助手。1905 年集资修筑新宁铁路，自任总理兼工程师。也有不少企业是以高薪延聘外籍技术人员，如三角洲的很多缫丝厂、火柴厂都聘有外籍工程师。重视技术、重视人材，是很多侨资企业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三） 侨资是三角洲近代化过程中资金的重要来源。与其他口岸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珠江三角洲的近代工业主要是民族工业，而华侨资本又是三角洲近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投资来源。

据不完全统计，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至抗战前，华侨在三角洲共投资二亿四千万元。其中，工矿业投资 2125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8.8%；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交通业共投资 8778 万元，占总额的 36.5%；房地产业投资最多，为 13188 万元，占总额的 54.7%。从投资分布来看，广州为华侨投资的综合性地区，几乎各行各业都有投资，其中又以房地产业、市政建设为最多；顺德、南海、番禺以工业投资为多，主要是缫丝业；新会、中山、台山、开平一带则以商业、金融、交通、服务业投资为多。此外，三角洲各市县的电灯、电话公司，自来水厂等也多是华侨投资兴办的。

投资地点的相对分散（分布于主要侨乡），是三角洲华侨投资的一个特点，这也正是华侨爱国爱乡、关心家乡建设的具体反映。以工业投资为例，在三角洲的全部工业投资 2043 万元中，广州市的投资为 607 万，占总额的 29.7%；新会、台山、开平等县的投资额近千万元，占

总额的 48. 9%；顺德、南海、番禺等县为 437 万元，占 21. 4%。

商业服务业、金融、交通等第三产业投资高于工业投资，是三角洲华侨投资的又一特点。一方面这与三角洲的历史和华侨的个人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它也是与三角洲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而市政建设、公共交通、电灯、自来水等公用事业方面的投资，将现代文明的成果引进县城村镇，方便了人民生活，开启了人们的眼界。这些软环境方面的投资，对于改善三角洲的整体社会环境，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起着无形的、然而却是极为深远的影响。

近代工业较多地分布于乡镇，各类服务设施齐备，各级流通网络畅通，三角洲农村经济充满活力，呈现一派繁荣富裕景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广州的发展远不如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但珠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乡镇经济的发展却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三角洲在乡村近代化方面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这一点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国近代化的关键在农村。三角洲有开放的传统，有华侨投资的传统，现代文明之果较早地播种于乡村，使商品意识、科技意识、人材意识深入人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近代以来商品经济与民族工业发展的这一轨迹与特点，为今天三角洲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与其自身的近代化、工业化过程相结合的。如果说宋代以来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的量的积累过程的话，至此则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广州独口通商地位的丧失，一度给三角洲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然而，三角洲的商品经济并未就此一蹶不振，经过短时期的调整，抓住世界市场对粤丝需求扩大的有利时机，引进先进的机器缫丝工艺，发展缫丝工业。从而使三角洲的商品经济在近代工业基础上跃上一个新的高度。以缫丝工业的发展为中心，三角洲的农业、商业、外贸、金融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以近代工业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通过国际市场的循环，使三角洲农村经济充满活力。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以顺德、南海为中心，以出口为导向的贸—工—农经济体系大体形成。蚕丝业的出口收入每年达五、六千万海关两，占广州外贸出口总额的 50—60%，成为三角洲经济的主要支柱。

华侨在三角洲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华侨是三角洲民族工业的创始者，侨资是三角洲近代化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华侨引进机器，引进技术，把现代文明之果带回家乡，并使之生根、开花。华侨在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公共事业方面的投资，不仅对三角洲经济发展本身，而且对改善三角洲的整体社会环境，更新人们的观念，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中国农村近代化的关键在农村。缫丝工业之扎根于乡村和华侨投资的分散性特点，使珠江三角洲在乡村近代化方面远远走在全国的前列，三角洲是中国农村近代化的先行者。近代以来三角洲商品经济与民族工业发展的这一特点，也为今天三角洲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①请参见叶显恩、许檀《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载《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②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 2，初与邱滋畲书。

③④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二)，页 66，148。

⑤《史料旬刊》第22期，庆复折。

⑥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一)，页516；骆宝善《太平天国时期的广东天地会起义述略》，载《中山大学学报》1981—4。

⑦⑧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页12，页5—6，82—85。

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页82。

⑩⑭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转引自《近代广州外贸研究》页104，103。

⑪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二)，页1040，765。

⑫同上书，(三)，页1488。

⑬同治《番禺县志》卷8，物产；民国《清远县志》卷14，土产物；光绪《新会县乡土志》卷14，茶。

⑯㉗ 汪敬虞《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学术研究》1962—6。

⑰⑲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页965—968。

⑱⑳饶信梅《广东蚕丝业的过去与现在》，《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7号，1930年。

㉑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页969；《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新会县；考活《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

㉒㉓刘伯渊《广东省蚕业调查报告书》；考活《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

㉔赖功奏《广东粮食问题的研究》，载《农声》181—182期合刊，1935年。

㉕《广东农业调查报告书续编》，顺德县，南海县。

㉖区季鸾《广州之银业》，1930年。

㉘㉛㉜㉝㊱丘捷《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在广东的发展》，载《学术研究》1983—4。

㉙参见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4表。

㉚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二)，页869—920，历年设立厂矿名录、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以及光绪25年—宣统3年《关册》等统计。

㉞孙毓棠前引书，页1033。

㉟㊲林金枝等前引书，页473，371—378，492—496。

㊳本节资料主要依据林金枝等前引书的有关章节，不再一一注出。

表一　鸦片战争前茶叶、生丝出口占广州出口商品总值的%

单位：万　元

年　分	出口总值	茶　叶	%	丝及丝织品	%	合　计	%
1821	2230	1179	55. 85	499	22. 38	1678	75. 23
1822	2047	1194	58. 33	510	24. 92	1704	83. 49
1823	2102	1231	58. 57	337	16. 01	1568	74. 58
1824	2229	1348	60. 50	338	18. 75	1686	79. 25
1825	2657	1357	51. 08	514	19. 34	1871	70. 34
1826	2205	1256	56. 98	306	13. 87	1562	70. 85
1827	2428	1240	51. 07	337	13. 88	1577	64. 95
1828	2319	1132	48. 81	419	18. 06	1551	66. 87
1829	2504	1105	44. 12	349	13. 95	1454	58. 07
1830	2420	1055	43. 60	392	15. 90	1447	59. 50
1831	2282	1219	53. 41	461	20. 21	1680	73. 62
1832	2641	1524	57. 70	359	13. 59	1883	71. 29
1833	2018	871	43. 18	343	16. 99	1214	60. 17

资料来源：

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页254—255计算

表二　民国年间广州的生丝出口量及其在出口总值中所占%

年　　分	出口总值（万两）	生丝出口 输出量（担）	输出值（万两）	占出口总值的%
1911	5001	36639	2203	44.05
1912	4288	36227	2038	47.53
1913	5594	48030	2906	51.95
1914	4414	35194	2295	52.00
1915	4213	32891	2124	50.42
1916	5507	38296	3098	56.24
1917	4999	39894	2883	57.66
1918	5044	33261	2737	54.26
1919	6468	47028	3779	58.42
1920	5922	23581	2897	48.91
1921	7133	49613	4346	60.92
1922	8902	50028	5847	65.69
1923	9023	43722	5382	59.64
1924	8278	46569	4629	55.92
1925※	4983	24129	2520	50.57
1926※	4523	13751	1440	31.84
1927	6998	47053	4371	62.49
1928	7337	49226	4484	61.15
1929	7510	53488	4883	65.02

资料来源：饶信梅《广东蚕丝业的过去与现在》，
载《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7号，1930年

※　1925、1926两年因香港海员罢工，广东生丝有很多转由上海出口：
1925年由广州出口2520万两，由上海转口3150万两，合计为5670万余两；
1926年由广州出口1440万两，由上海转口4140万两，合计为5580万余两。